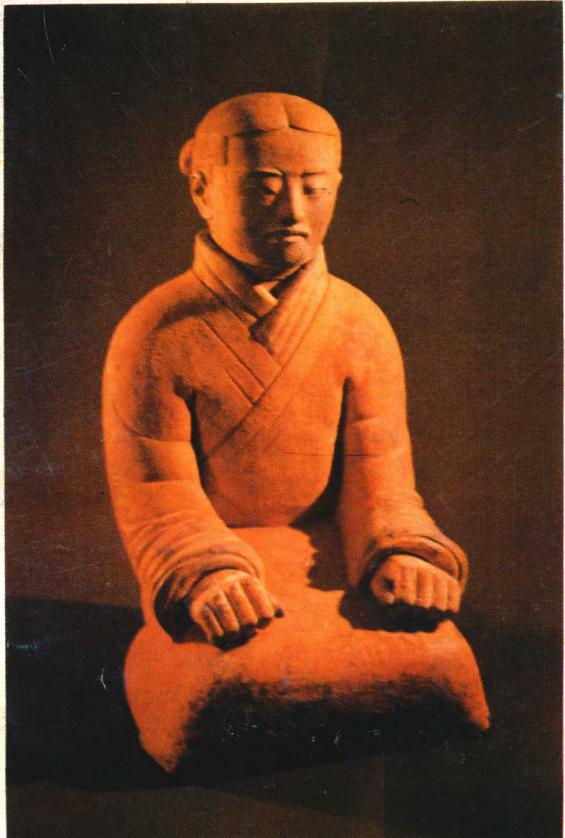


文史知识



关于清初学术的几点认识 陈祖武

怎样读《后汉书》 黎虎

胎教探源 傅荣

诗人与驴 刘尊明

10

中华书局

WEN SHI ZHI SHI

1993



医药学院610 2 01478753

文史知识

1993年第10期

(总第 148 期)

· 治学之道 · 历史研究与理性思维

——金宝祥教授访谈录

沈颂金整理 3

· 文学史百题 · 英雄割据虽已矣 文采风流今尚存

——曹操文学批评与曹丕、曹植文论中若干问题新探

顾易生 11

· 历史百题 · 关于清初学术的几点认识

陈祖武 18

· 怎样读 · 怎样读《后汉书》

黎虎 25

诗
文
欣
赏

孤愤茫茫塞天地

——《诗经·邶风·柏舟》浅探

唐佩瑶 32

博喻与哲理

——苏轼《百步洪》(其一)试析

张晶 36

假境见意 旨冥句中

——说朱庆余《近试上张水部》

鲍传龙 40

桃花扇底浩叹多

——孔尚任《鹧鸪天》赏析

吕美生 43

· 古代科技漫话 (56) ·

胎教探源

傅荣 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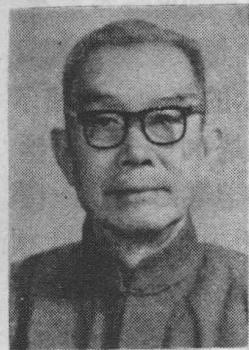
· 德国的汉学研究 (11) ·

从“三分天下”到诸侯称霸

——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德国汉学 (上)

张国刚 50

文 化	古代赐书小考	曹 之	57
史	“纳须弥于芥子”		
知 识	——中国古代微型工艺漫话	俞 莹	63
神的色彩 人的世界			
——元道教题材剧人物形象摭谈 丁淑梅 69			
诗人与驴			
——古代诗人创作生活及审美心理管窥 刘尊明 75			
· 中外文化交流与比较 ·			
明清皇宫的西洋乐器 毛宪民 82			
· 宗教与人生 · 道教与玉文化 刘素琴 86			
人 物	忠精烈烈、硬骨铮铮的颜真卿	刘新科	91
春 秋	祁顷与鸦片战争 崔克诚 高淑明	95	
· 文史研究动态 ·			
近十余年三言二拍研究之回顾 王立言 荀人民 101			
语 言	论“有” 齐冲天 108		
知 识	说“胜日” 师为公 112		
· 青年园地 ·			
魏晋南北朝的妒妇之风 张兆凯 114			
· 文史古迹 ·			
世界上最古老的铁索桥——霁虹桥 张焕明 119			
· 读者 · 作者 · 编者 ·			
也说“角先生” 蒋宗福 122			
“揠苗助长”之争鸣(选登) 景 健 初钊兴 124			
补白 5 则: 维新运动的上下限(10) 紫禁城的报警系统(94) 弥勒 的三个艺术形象(100) 近代新型城市的社会影响 (121) 蜚声中外的汝窑瓷器(127)			
宋代汝窑瓷器三足洗(封二) 云南霁虹桥(封三)			



·治学之道·

历史研究与理性思维

——金宝祥教授访谈录

金宝祥先生，1914年出生于浙江省萧山县。1934—1938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其后曾在四川大学等校任教，现任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唐史研究会顾问、甘肃省历史学会会长等职，主要著作有《唐史论文集》、《隋史新探》(合著)以及论文多篇。

问：金先生，作为隋唐史研究的专家，请谈谈您的经历好吗？

答：我1914年出生于浙江省萧山县。那时正处于风云变幻的时代，浙江作为沿海省份，人杰地灵，大批留学归国的仁人志士在中学任教。所以，从中学时代起，我便受到了良好的启蒙教育。考入北京大学后，更是获益匪浅。当时许多文化界的精英，如胡适、周作人、钱穆、陈寅恪等大师都在北京大学担任教授，得以聆听他们的讲课，真是此生有幸。从北京大学毕业后，我受聘在一所中学任教，后又被四川大学招聘，1950年来到西北师范大学，直到现在。

问：金先生，读您的文章，总感到行文缜密，逻辑性特别强，并且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也恰到好处。您能谈谈这方面的经验吗？

答：历史研究绝不是史料的单纯搜集与罗列，而是要注入作者的理性思维。司马迁的《史记》之所以名垂千秋，至今仍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原因就在于司马迁具有一种理性思维，并把这种思维贯注于《史记》的写作过程中。解放前在北京大学读书时，耳濡目染，无非考据。其后虽说研究历史，但是现在看来，那种研究显得多么幼稚。来到西北师范大学后，我开始阅读马克思、恩格

斯、列宁的著作，好像在我面前打开了一扇窗户，使我眼界大开。特别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写得真是精彩极了，每读一遍，都有无限的收获。八十年代以来，我开始阅读黑格尔的著作。黑格尔不愧是哲学大师，他的理论对我影响深远，尤其是《小逻辑》一书，捧读再三，仍有无穷意味尚可把玩。列宁的《哲学笔记》也是一部经典名作，值得反复研读。所以，我想，从事历史研究的人，阅读历史文献古籍固然重要，但若再读一些经典理论和哲学著作，更能使自己的研究如虎添翼。这是我的经验。

问：金先生，您研究了几十年的历史，一定有许多感想与体会。请您向青年人谈谈您的治学方法好吗？

答：谈不上有什么治学方法，治学的门径不一，不可能强求一律。这里，我仅谈一谈自己的感想与体会，供青年人参考。

构成我学术基础的有三部分：一是文献资料；二是东方哲学名著；三是马列经典著作、黑格尔的哲学名著。而这三部分又是逐渐形成的。早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我便埋头于文献资料的搜集，可以说是受了钱穆师的影响吧。他的《先秦诸子系年》就是广集史料、论述详尽的一部著作。那时认为有了史料便有了一切，历史不过是文献资料的堆积。从大学三年级起，我读《宋史》而摘录的资料足有整整一大本。而我的毕业论文《宋高宗南渡前后两淮及西北居民之南迁》以及后来写的《南宋的马政》都可以看作这方面的代表。

大学毕业后，在《三民主义丛书》编纂委员会工作的一段时间里，阅读了部分文献历史资料，后又因为写作《和印度佛教寓言有关的两件唐代风俗》，阅读了部分佛教经典，又为深奥莫测的东方哲学所折服。我们批判宗教是毒害人民的鸦片。其实，佛教经典中蕴含着极其深粹的哲理，如果深入其内部，就会发现它是一个蕴藏无穷珍宝的无底洞。但是，现在想来，东方哲学固然有其优越性，如比较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详述做人的道理，仅仅“仁义”二字，就显现出孔孟理性思想的奥义。但是东方哲学也有其缺点，即太笼统、不确切、模糊不明。我对佛教有一种深深的眷恋

之情，至今仍想仔细研究一下隋唐时期的佛教。恐怕没有精力实现这个愿望了。

解放后，我开始接触马列经典作品，初读时尚不能理解，但是渐渐地便入了迷。尤其是马克思的《资本论》，我读了足有二三遍，每读一遍都犹如跃上一个新台阶。读懂后，自己的思维功能扩展了许多。它犹如一把刀，剖析了中国社会的许多问题。正是读了《资本论》，我才对历史上的诸多问题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即使对文献资料也有了新的认识。我觉得历史资料并不仅仅具有文字上的功能，它包含着作者的理性思维。而一个真正研究历史的人，应该能够透过文字的表面看出问题的实质。我的“生产者依附关系的强化”便脱胎于马克思的《资本论》。

进入八十年代，我开始阅读黑格尔的哲学著作。他的《小逻辑》一书对我的治学影响甚远。黑格尔的哲学貌似深奥难懂，令人望而却步。但是，只要你潜心研读，便会享受到无限的乐趣。他的每一句话都意味深长，给人以无限的启迪，使人浮想联翩。我的“理性思维”便渊源于黑格尔哲学。直到现在，我仍在读黑格尔的《小逻辑》、《精神现象学》等著作，从中汲取无穷的智慧。

这三部分间的关系不是孤立的，而是互为依赖，相辅相成的。只有三部分合而为一，浑然一体，才能谈得上研究历史。历史的最终归宿是集中到一点，所谓“一点”，就是形成一种体系，但要达到这一点却非常难。研究历史的人要不断提高自己的主观思维能力，不要被一些假象所迷惑，要透过事物的表面看到其本质。现在，我已经进入耄耋之年，记忆力大为衰退，但是，只要记忆的闸门一打开，思维细胞便急速运转。这也是我引以为豪之事。

因此，我觉得，研究历史必须有一定的哲学作为基础。纵观古今中外，任何历史学家必然是哲学家。

问：金先生，您的最早两篇文章是写有关唐代风俗的，属社会史研究范畴。可是您后来却把研究领域转移到了经济史方面，特别是唐代两税法的研究，请您谈谈其中的缘由。

答：我的第一篇论文《和印度佛教寓言有关的两件唐代风俗》

是在四川大学教学时写成的。当时我对中西交通史很感兴趣，看了不少有关这方面的专著和论文，这些专著和论文认为唐代的壁画、雕刻、音乐等因受西域(包括印度)佛教艺术的影响，已成为一种新兴的、具有民族风格的艺术。我从浏览史传、释典中发现几件唐代割股、燃灯等奇异风俗的渊源流变，认为随着佛教习俗的东渐，到了唐代，由于受到中国儒教思想的影响，由割股供养转变为割股疗亲、燃灯祈福转变为燃灯歌舞的富有儒教内容的新兴儒教习俗了。原本准备还要写寒食扫墓、放纸鸢等风俗，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写成。解放后，阅读了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后，我觉得一切社会的主要矛盾都可以从经济因素中去寻找。而唐代经济研究中有许多问题尚未得到解决。比如安史之乱后的经济发展问题，史学界几乎众口一词，认为安史之乱后，唐代的经济发展水平倒退了。其实，这一时期正是商品货币关系繁盛时期，人身依附关系的减轻、货币的广泛流通、商业高利贷资本的迅猛发展、以货币地租为主要内容的两税法的创立、封建剥削率的增长等等，无不反映了经济领域内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一时期就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条件，例如“飞钱”、“邸肆”的出现便是例证。还有两税法……

问：谈及两税法的研究，您提出了与众不同的观点，至今仍未得到大多数专家学者的认同，您能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吗？

答：两税法的出现，是我国中世纪史的一件大事，是我国历史上赋税制度的一大变革。它承上启下，影响巨大，甚至明清时期的“一条鞭法”和“摊丁入亩”都可以看到两税法的痕迹。但是，传统的观点均认为：两税是夏秋两季两次征收的户税加地税的总和。事实上，两税仅是夏秋两次征收的户税而已，并不包括地税。我在《安史之乱后唐代封建经济的特色》一文中提出了比较有力的证据，兹不赘叙。至于说到认同，那也不能勉强。我也看过不少反驳文章，没有一篇令我信服，以致改变自己的观点。

问：您在文章中提出了“生产者依附关系的强化”作为经济研究的基础。请您略加阐释。

答：在阶级社会中，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是生产资料所有者和非所有者之间一定的阶级关系。而一定的阶级关系是一定历史时期最根本、最一般的关系。直接生产者受大土地所有者的统治奴役而缺乏人身自由的依附关系是封建社会最一般的关系。秦汉时期，私家佃农对私家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尚未强化，从北魏中叶直到唐初，在农民起义的风暴中，受高门世族羁绊的隐户不断脱离控制，变为国家的编户，国家佃农受国家政权严峻控制而呈现出人身依附关系强化的趋势，也正是均田制的实质。开元天宝之际，均田制的瓦解，标志着国家佃农人身依附关系由强化而减弱的过程。在“生产者依附关系强化”的支配下，所有的政治、军事、思想、民族等关系，莫不以此为基础。可以说，“生产者依附关系”是经济领域研究的一把钥匙。

问：近年来，您在隋唐史研究领域又有许多新的探索，比如《隋史新探》。

答：是的。比如对于隋文帝父子、唐太宗父子倾全国之力，三番五次攻打高丽一事，开始我百思不得其解，经过潜心研读有关史籍，边读边思，始有所悟。北方草原部落组织自北魏到隋唐，鉴于中原王朝军事势力的扩充，都在处心积虑地谋求抵制，西方的吐蕃、吐谷浑本源于同一部落民族，再加上东北的高丽，从而形成一个东西呼应、笼罩北方的强大弧形包围。高丽的多次往聘江南，正是这一弧形的反映。中原王朝为了消除这个弧形包围圈，遂有隋文帝父子、唐太宗父子的讨伐高丽之举。还有谣传杨炎害死刘晏一事。

问：您非常推崇杨炎，认为他是最具理性思想的人，并且著文为杨炎害死刘晏一事辩诬，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答：在历史文献中，为不确切的、带有偏见的、甚至是伪造的史料所掩盖而混淆历史真相的事例不胜枚举。这就需要我们反复细读，通过理性的思维，从宏观中见到微观，从微观中见到宏观，恢复历史真相。谣传刘晏被杨炎害死一事，正是历史的错谬。

刘晏与奸佞宦官程元振相朋附，并且和叛乱首领朱泚相勾结，

可见其品德与为人了。当时朝野上下分作两派：一派叛逆阵营以宦官为首，联络藩帅、公卿，专事篡夺、谗害与叛乱。另一派反叛逆阵营以杨炎为首，以联络部分文武大臣，尽心竭力地去创设两税法，充实中央财赋，建立一支强大的禁军为职责。而刘晏正是叛逆阵营中的一员，作为宰相的杨炎，验证上奏，自属正当，无可厚非。而唐德宗赐刘晏以死，与杨炎毫无关系。这一谣传完全出于以李正己为首一伙人对杨炎的诬陷，而杨炎所遭受的罢相、贬窜乃至被杀害，则是对他真正的陷害。杨炎创立两税法，实欲收回由宦官控制下的财权，按等第征税，再也没有其它徭役，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假若杨炎不被杀害，建立起强大的禁军，那么宦官、藩镇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条件了。我说杨炎是具有理性的人，正是指他具有正义感、是非感，使自己的主观思维，深入于客观的本质，显现出思想的光芒。

问：请您再谈一谈理性思维好吗？

答：黑格尔说：“理性是世界的灵魂，理性居住在世界中，理性构成世界的内在的、固有的、深邃的本性。或者说，理性是世界的共性。”也可以说，凡是对客观事物——不论自然和社会的本质或规律，在实践的基础上，通过思维活动反映在头脑中的正确认识；或者说，主观思维和客观本质相一致的认识，即理性，方可称为真正的思想。客观世界的本质，纯粹至美，而主观世界只有达到理性世界，才能达到纯粹至美。因为理性是人的最高本质，是灵魂，只有通过理性思维，才能探索出客观世界的本质。希望每一个研究历史的人都具有理性思维，不断地否定自身，甘愿寂寞、坚韧、读书、思考，有所创新，开拓历史研究的新领域。

问：您在几十年的治史生涯过程中，对历史的本质也一定有许多真知卓见。请您就这一方面谈谈好吗？

答：历史的本质是一种纵贯古今的思想。历史是纷纭复杂的，只有从大量的现象形态里去探索出本质的关系或内在的运动规律，才能真正地显现出历史的科学性和革命性。恩格斯指出：“人类的历史……是人类本身的发展过程，而思维的任务现在就在于

通过一切迂回曲折的道路去探索这一过程的依次发展的阶段，并且透过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律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421页）历史是痛苦的，同时也是罪恶的，但也在不断的否定中向前迈进，超越本身。无论历史如何发展，总有一些具有理性思维的人，他们不应该被遗忘。历史研究者的任务就是弘扬理性精神。一个真正具有理性的人，不见得能成为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科学家和思想家，然而一个真正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科学家和思想家，必定具有光辉的理性。作为一名史学工作者应当认识到，历史科学的任务并非仅仅叫我们写几篇带有规律性的论文，更主要的是叫我们在揭示规律的同时，遵循马克思的思想，结合历史实际，严格要求自己，做到古今相通，主客观相统一，发扬理性，追随科学，为争取共产主义的到来，去真正解决几个切合实际的有关历史科学的重要问题。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界、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这是多么感动人的语言啊！

问：当今许多青年史学者有一股躁动不安的心理状态，他们想急于得到社会的承认。您是如何看待这种现象的呢？

答：做学问本来就是一桩枯燥乏味的工作。只有耐得住寂寞，习惯坐冷板凳，抛弃功名利禄等私心杂念，方能成功。当然，研究工作必须以一定的物质条件为基础。年轻人思维敏捷，反应迅速，这是优点。但若以此为资本而不去下苦功夫读书学习，那么将会导致“聪明反被聪明误”的结果，历史上不乏此例。其实，一个真正具有理性思维的人，无不历经苦难与坎坷。以司马迁为例，他的《史记》正是把具体的历史变为哲学的抽象，反映了他具有光辉的理性。

文章要写，但切勿贪多，多必滥，而滥便保证不了质量。因此，我希望年轻的史学工作者在写一篇文章之前，一定要凝思熟虑，不要给人“似曾相识”之感，要有自己的东西，“人云亦云”不是做研究工作。我的藏书不多，读书也较少，尤不喜欢寻求一些稀奇古怪的材料，而是从常见的史料中找出别人看不到的问题。在

这方面，陈寅恪师给了我很大的影响。除阅读正史外，历代的笔记小说中也有许多宝贵的史料。因此广泛博览对历史研究者来说也非常重要。只有从总体上把握问题的实质，高屋建瓴，方能领会其真谛。

问：金先生，您虽已年愈古稀，每日依然读书思考工作，令人敬佩。请问您今后有什么打算呢？

答：人脑只有不断地思维，才不至于僵化老死。我虽然年届八旬，仍打算在有生之年完成一本关于两税法的著作。这本书不仅仅是经济范畴的研究，还要加入政治分析，把人物评价同政治经济活动结合起来。从两税法的渊源写起，一直到南宋时为止。当然，我仍要以两税法为中心，重点突出杨炎的理性思想。如果天假我年，我还想写一写唐代的佛教。

(沈颂金整理)

维新运动的上下限

关于维新运动的上下限，史学界大体有两种意见，即1895年“公车上书”至1898年戊戌政变；或1888年康有为上书至1905年同盟会成立。孙应祥、皮后锋在《南京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著文《论维新运动的上下限》提出了不同观点。他们认为，维新运动是对洋务运动的继承与发展，前者上限与后者的下限紧密相联。1895年甲午战争的结束标志着洋务运动的下限，同年的公车上书即为维新运动的上限。关于维新运动的下限，以康梁为核心的维新派只是维新派的一部分，政治改革也只是维新运动的一个侧面，因此，尽管政变使维新运动受到很大挫折，维新派遭到严重打击，但并不能由此断定维新运动就此中断。政变后，维新运动仍得到延续和进一步发展，群众基础更加广泛，康梁集团在海外十分活跃，影响辐射到国内。保皇会在维新运动的另一个侧面即爱国救亡运动中起了主导作用。维新运动的下限应与辛亥革命的上限紧密相连。1903年，拒俄运动、《苏报》案等事件的发生，对社会思潮极有影响。革命与维新两种思潮正式分野，革命思想开始取代改良思想，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1903年，还是政治上的分水岭，革命以排满为宗旨，并付诸行动。因此维新运动的上下限应在1895年—1903年。

英雄割据虽已矣

文采风流今尚存

顾易生

曹操文学批评与曹丕、

曹植文论中若干问题新探

在古代英雄人物中，用兵“仿佛孙吴”（诸葛亮《后出师表》中语）而文采媲美风骚者，曹操殆当其选。“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便是对其武略、文才的高度概括。曹操及其二子曹丕、曹植是三国曹魏政权的创建者，也是建安文学的领袖。他们的“横槊赋诗”（元稹《杜甫墓志》中语），辉映千古；文学理论批评方面也迭树丰碑。然如今一般“文学批评史”论著中，曹丕、曹植均占相当位置，曹操则因文献不足而鸿迹希渺，令人怅惘。故本文首从曹操本人创作以及《三国志》、《文心雕龙》等古籍中寻掇有关吉光片羽，钩沉抉微，聊补缺憾；而于曹丕、曹植文论，则就其中某些问题略伸管见，以期疑义共析。

一

曹操乐府诗《秋胡行》二首中共九处重申“歌以言志”，而《步出夏门行》四解也各以“歌以咏志”作结，反复明确表示继承发扬“诗言志”的传统，以乐府诗歌来抒发自己的豪情壮志、社会理想。《苦寒行》末两句云：“悲彼《东山》诗，悠悠令我哀。”则反映他对《诗经》中描写远征战士思念家乡心情而具有现实意义与人道精神篇章的特殊感受。《短歌行》开端的悲壮沉雄之声：“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实为曹植自述“雅好慷慨”（见本文下引）创作倾向及建安诗风“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文心雕龙·明诗》）的创导。

《文心雕龙·时序》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充分肯定曹操在开创一代文风与培养团

结作者方面的主导作用。曹丕《典论·论文》中称道的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即文学史上所谓“建安七子”，与曹植《与杨德祖书》的杨修，原都是散在各处的优秀作家，先后为曹操所罗致与任用，与曹丕、曹植兄弟游处酬应，植书所谓“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三国志·魏书·陈琳传》所载事例，可谓典型。陈琳初曾事袁绍，作檄极诋曹操以至其父、祖。”袁氏败，琳归太祖（曹操）。太祖谓曰：“卿昔为本初（袁绍字）移书，但可罪状孤而已，恶恶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谢罪，太祖爱其才而不咎。……太祖并以琳、（阮）瑀为司空军谋祭酒，管记室。”该传裴松之注引《典略》曰：“琳作诸书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头风，是日疾发，卧读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数加厚赐。”宽容人才的雅量，欣赏文章的激情，跃然纸上了。曹操也曾率直地批评他人文章的缺点。《文心雕龙·事类》载：

故魏武称张子之文为拙：“然学问肤浅，所见不博，专拾掇崔、杜小文，所作不可悉难，难便不知所出。”斯则寡闻之病也。

范文澜注：“魏武语未知所出，‘然’字疑衍。”按“然”字于此虽似语不贯通，却未必衍文。想来曹操整段评语，原本有褒有贬，而于褒贬上下文之间置此转折之词。刘勰只节录贬辞，而存此转折语于首，遂致匪解了。杨明照先生疑张子为张范。据《三国志·魏书·张范邴原传》，邴原与张范都是曹操吸引的人才。裴松之注引《原别传》载：曹操“令曰：‘邴原名高德大，清规邈世，魁然而峙，不为孤用。闻张子颇欲学之，吾恐造之者富，随之者贫也。’”这里品评人物与文学批评相通，可见曹操的褒贬倾向。

曹操渴求人才，“唯才是举”，不拘一格，《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云：“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曹丕《典论·论文》历评诸优秀作家而分析其长处与短处，指出“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曹植《与杨德祖书》也说“以孔璋（陈琳字）之才，而不闲辞赋”；又说“世人之著述，不能无病”。

这些当是曹操人才理论与批评方法影响下的作家论。值得注意的还有：孔融因得罪曹操而被杀，可是曹丕《典论·论文》中仍首举孔融，评语也有褒有贬，称他“体气高妙，有过人者”。不因“罪死”而抹煞全人，不因人废言，这里也反映曹氏父子共同的品评人物与文章的风度。曹丕不会也不敢在此抵触其父观点的。

《文心雕龙》又载曹操对多种应用文体与文学创作形式方面的意见：

曹公称为表不必三让，又勿得浮华。所以魏初表章，指事造实，求其靡丽，则未足美也。（《章表》）

魏武称作敕戒当指事而语，勿得依违。晓治道矣。（《诏策》）

昔魏武论赋（一作“诗”），嫌于积韵，而善于资（一作“贸”）代。（《章句》）

又诗人以“兮”字入于句限，楚辞用之，字出句外。寻“兮”字成句，乃语助余声。舜咏南风，用之久矣。而魏武勿好，岂不以无益文义耶？（《章句》）

按章表乃臣下的上行文书，敕戒为君上的下行文书，关系军国之事，行文自当名实相符，明朗准确。华过其实，必然不切事情；含糊其辞，势将令人无所适从，都会引起混乱。刘勰大概受当时骈俪盛行的影响，致对魏初表章求实文风有华美不足之感；然而他仍称赞曹操论敕戒的意见为通晓治理之道。曹操这里关于诗赋的意见虽较零碎，也表现他对用韵、炼字艺术的讲求。从以上征引，说明曹操对文体特点颇有评论，可惜只存片段。曹丕《典论·论文》中提出比较完整的文体论：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

指出各种不同文体各自应有的特征，在某种程度上当反映曹操的意向。

《文心雕龙·养气》载有“曹公惧为文之伤命”一语，语焉不详，也属文气论系列中的一说。

曹丕的《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文学专论，运用审美眼光来评论了当时许多作家、多种文种，并论述了作者个性气质与创作的关系，奠定了古代形式批评的基础。其中“诗赋欲丽”一语，为近时论者指为文学自觉时代的一个标志。但也应看到，曹丕《论文》中不少说法是有所承受的，当然也有发展、提高。不过以“丽”论赋，则久已成为人们的共识。《楚辞·招魂》的“结撰至思，兰芳假兮”，已揭示作赋过程中精心极意的构思与清词丽句的缀用。《汉书·王褒传》载西汉宣帝曾说：“辞赋，大者与《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扬雄《法言·吾子》更指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揭示“丽”早是诗人、辞人作赋的共同追求，只是程度有差而已。“则”是合度，“淫”是过度，都属形式问题。“丽以淫”，犹“靡丽”（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评司马相如赋语）。比较起来似以曹植赋论，更能代表这个文学自觉性发展重要阶段的审美趋向与时代精神。其《前录序》云：

故君子之作也，俨乎若高山，勃乎若浮云，质素也如秋蓬，摛藻也如春葩，泛乎洋洋，光乎膈膈，与雅颂争流可也。余少而好赋，其所尚也，雅好慷慨。

“浮云”、“春葩”云云，形象地表现了丽辞的特色，而“高山”、“秋蓬”则体现神思、质朴方面的审美理想，与丽美对立而统一，形成辞赋气象的无限风光。“慷慨”指感情激荡，意气风发。《文心雕龙·时序》论建安文学云：“观其时文，雅好慷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借用曹植的话作为这整个时代文学精神风貌的概括，是很有批评眼光的。

曹丕、曹植兄弟关于文学地位、作用的评说，看来似乎有大相径庭者。曹丕《典论·论文》云：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

曹植《答杨德祖书》则云：

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昔杨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吾虽薄德，位为藩侯，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

近时不少论者以曹丕推崇文章的观点为进步而以曹植的贬低辞赋之说为囿于传统，偏属保守。这是须作具体分析和进行深入讨论的问题。

其一，为什么平生“好赋”的曹植在这里贬低辞赋为小道呢？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分析道：“第一，子建的文章做得好，一个人大概总是不满意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他的文章已经做得好，于是他便敢说文章是小道；第二，子建活动的目标是在于政治方面，政治方面不甚得志，遂说文章是无用的了。”这段话有其卓识，也有未安处。诚如陈良运教授所指出，曹植作此书时年二十五，政治上尚未失志。然而曹植一生不论在前期得曹操宠爱时或后期受压抑时，都是以建功立业为职志，而不愿以文人自限。他辞赋写得好，爱好辞赋，却不希望被人看作辞赋家。故此须要郑重声明。

其二，曹丕所推崇的“文章”，主要指学术著作和有关政教的文献。《典论·论文》于“古之作者”首举“故西伯（周文王）幽而演《易》，周旦（周公姬旦）显而制《礼》”；而篇末独许徐干《中论》为“成一家言”。在他所谓“文章”中也包括纯文学的诗赋，然而诗赋既成为“经国大业”的组成部分，其文学的独立性是不完整的。在我国古代文论中素来有高度评价诗赋功用的，却又不免使之沦为政治教化的工具或附庸。《诗大序》所谓：“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乎诗。”班固《两都赋序》说：“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都是其例。有的论者说，曹丕既然认为“诗赋欲丽”，以美为诗赋特征，便是突破了政教的樊篱。但应该注意到，曹丕这段文体论的开头便说：“夫文本同而末异”。因而奏议之“雅”、书论之“理”、铭诔之“实”与诗赋之“丽”，都属于“末”，都是形式方

面问题，都在“本”的统帅下。这“本”是什么呢？从全文看，当指“经国”，即关系国家之治理。因之，各种文体之末——表现形式有差别，其根本却是共同的，即都附属于经国——政教的。

曹植以辞赋为小道，并非以“文章”为小道，这点也须辨正。他对经、子、史类学术著作以至民间作品，也是很推崇的。《与杨德祖书》中说过：“夫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也。”又说：“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则将采庶官之实录，辩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薤露行》云：“孔氏删《诗》《书》，王业粲已分。骋我径寸翰，流藻垂华芬。”这些说法，与曹丕的以“文章”为“经国之大业”等论大体相同。其差别仅在对辞赋的看法。曹丕把辞赋归入“经国大业”、“不朽盛事”之中，而曹植则贬之为“小道”，以为“不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这就是排除在“经国大业”、“不朽盛事”之外。然而这样恰恰划清了辞赋与政教及学术著作的界线，把辞赋作为独立的文学创作。汉代扬雄曾“少而好赋”，后因觉为赋属“童子雕虫篆刻”，无益于“讽”，故辍不复为（见《法言·吾子》）。现在曹植虽贬辞赋为小道，却仍然大为特为，而他的创作辞赋，雅好慷慨，任凭自己的兴趣好尚与感情冲动，自由驰骋，既不思以之经国，也不求借此不朽，其创作动机可以说是纯文学的，也有反传统意义的。实际上他本人身上也是文学家气质多于政治家，这包括他率直地抒发自己政治抱负等放浪任性的言行。

其三，自从《左传》所载春秋时“立德”“立言”“立功”的“三不朽”之说，便初步排列了德行、政事、文学著作三者的座次。这座次自可有不同排法，难说哪种排法为进步，哪种为保守。取消文学位置当然不对，如把文学置于所有其他事业之上，也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曹丕《典论·论文》中轻“荣乐”与“飞驰之势”而重文章之论，验诸其本人作为，殆有矫饰之处。鄙意妄度，这或许是竞争作接班人所表示的一种姿态吧！《资治通鉴》卷六八载曹丕、曹植兄弟政治角逐的情节耐人寻味：

植性机警，多艺能，才藻繁赡，操爱之。……丕使人问